

“逆全球化”态势下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作用分析 ——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

王学东 孙梓青

(中山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巴黎协定》为全球气候治理开创了以“自愿贡献”为特征的全新治理模式,标志着气候治理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当今世界“逆全球化”的态势却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蒙上阴影,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从演化经济学和不完全合同理论的视角看,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是国家在“有限认知”下所形成的不完全合同,而“逆全球化”的态势则冲击了原有的认知均衡,从而导致原有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失衡。“逆全球化”态势反映了参与者对全球治理体系的不满,暴露出原有治理模式的缺陷。在此情况下,各国需要对原有治理模式进行改革,调整原先的不完全合同,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模式的转型,在新共同知识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气候治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通过传播自身的经验和新的观念,扮演“知识型权威”的角色,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促进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向更为平衡的方向演化。在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提出“各尽所能、合作共赢”“奉行法制、公平正义”“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治理理念,有力推动了气候治理模式的转型;而在其他领域,中国同样要发挥引领性作用,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 演化经济学; 全球气候治理; 逆全球化; 中国引领

【中图分类号】 06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287(2017)03-0014-08

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气候治理一直是全球治理中的重要环节,然而面对如今国际社会的“逆全球化”态势,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面临着危机与挑战。气候治理体系该向何处发展?中国在气候治理体系中应当扮演怎样角色?这些课题不仅仅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同时也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IPCC)通过以来,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一直在艰难中曲折演变,从《京都议定书》的签订到哥本哈根会议,从坎昆气候大会到“德班平台”的建立,国际气候谈判愈发陷入僵局。而巴黎气候大会通过的《巴黎协定》则为全

球气候治理开创了以“自主贡献”为特征的新模式,标志着全球治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当今国际社会的种种迹象表明,“逆全球化”思潮涌动,“逆全球化”的态势开始显现,而这则为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蒙上了一层阴影。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如何在“逆全球化”的态势之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成为中国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

中国领导人曾在国内外多个场合表达出对于全球治理模式转型和中国参与的关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而全球治理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1]。

【收稿日期】2017-06-30

【作者简介】王学东(1974-)男,山西太原人,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南海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全球治理、气候变化问题、国际关系理论。

在巴黎气候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表示,一份成功的国际协定既要解决当下矛盾,更要引领未来,《巴黎协定》应该引领绿色发展,为全球更好实现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2]。在杭州 G20 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世界性挑战,中国与二十国集团要与时俱进、发挥引领作用,进一步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3]。通过这些讲话可以看出,中国有意愿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演化,并愿意在全球治理体系的转型中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然而,在学术界,虽然众多学者注意到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但大多缺乏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制度性思考。因此,笔者将以全球气候治理为落脚点,运用经济学中的演化经济学和不完全合同理论,剖析在“逆全球化”态势下中国在气候治理模式转型中所需要扮演的角色,探索在“逆全球化”态势下,中国为什么需要发挥引领作用以及中国应该如何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模式的转型。

二、“逆全球化”现象的剖析及其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压力

2017 年 6 月 1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决定退出 2016 年 11 月刚刚生效的《巴黎协定》。美国政府的这一行为,无疑是近期全球兴起的“逆全球化”风潮的又一个节点,为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对于所谓的“逆全球化”现象,学术界并不陌生。因为全球化本质上就暗含着正负效应的同时存在。全球化对资本主义的影响具有两重性:既导致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衰落,又促进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再崛起。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是经济全球化负效应的必然结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的基本战略就是逆全球化^[4]。学者们普遍认为,随着全球联系深化而来的不确定性,由于全球化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加剧不平等、引发危机的双重属性,导致人们对全球化的信心正在出现动摇。以主要工业化国家从全球化(或一体化)的主动后撤以及保守乃至极端主义政治势力的上台或兴起为标志的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让全球化的进程面临

着巨大的危机^[5]。

当前世界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及“逆全球化”态势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各种贸易壁垒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开始主张再工业化的政策,导致全球对外投资的萎缩与竞争。在国家战略层面,“冷战”后全球合作成为主流的态势正在被削弱,新的针对新兴大国的思维重新出笼。如何放大全球化的正面作用、消减负面影响,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来加强全球合作以度过当前危机以及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在此过程中的可能贡献等话题就成为学术界的热议话题。

早在巴黎气候大会之后,有关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改革以及中国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学术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有学者认为,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认识已经逐步走向清晰,并通过参与 IPCC 科学评估以及推动《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以积极的姿态和科学的态度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中国需要积极回应全球长期减排和低碳发展的要求,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治理的协同,强化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的建设,从而将气候变化更为有效纳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进一步参与国际机制的设计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6]。有学者认为,《巴黎协定》的达成体现世界各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平衡,代表着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变,而中国通过一系列行动,对《巴黎协定》的成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全球气候治理做出贡献^[7]。还有学者着重分析了“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形势与新特点,提出全面深化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是中国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中国在“后巴黎”时代应当着力开展主动型国际合作、利用多边合作平台、提高国内机构能力,从而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8]。另有学者指出,《巴黎协定》体现出以各方自愿合作行动为特征的新全球治理理念,而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将加速世界低碳化的转型。中国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发挥建设性和引领性的作用,倡导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制定并实现有雄心、有力度的 INDC 目标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的根本性变革^[9]。还有一些学者将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气候外交相联系。伴随着在气候治理中地

位的上升和责任的扩大,中国将继续与国际社会一起巩固全球气候治理的成果,警惕“逆全球化”的趋势,强化中国绿色发展的趋势,开展气候外交^[10]。此外,有学者对“逆全球化”的国际背景和中国的应对给予关注,认为面对“逆全球化”的不利国际形势,中国应当推进实现更平衡、更发达、更包容、更多元、更可持续发展的“新全球化”。在未来,中国将同世界各国分享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者、支持者以及全球政治经济规则的重要决策者、引领者,扮演全球化的“领头羊”^[11]。有学者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达沃斯论坛的讲话,认为中国应当以开放的态度抑制“逆全球化”的思潮,以积极有为的姿态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担当全球治理的重任并有所作为^[12]。还有学者强调,大国既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也可以是去全球化的主导性力量。面对当前的“逆全球化”态势,中国有能力、有必要推动新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形成,力促大国协调均衡下的全球秩序^[13]。

三、理论模型: 演化经济学视域下的全球气候治理问题

演化经济学和不完全合同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演化经济学通过分析行为体在互动中对新知识的“学习”过程,关注“有限理性”下不完全合同的变迁和制度的演化。演化经济学认为,不完全合同是拥有不同认知模式参与者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主观认知均衡,即参与者之间的共同知识。而由于认知的有限性,所有基于共有知识所达成的合同都是“不完全合同”,一旦共有知识发生变化,那么原有的不完全合同则会发生演化。而在不完全合同演化的过程中,“权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参与者认知的有限性与合同的不完全,原先(不完全)合同的条款无法涵盖所有可能出现的交易状态。而一旦行为体遭遇到原先没有写入合同的新知识或是新场景,原有的共有知识则可能出现失衡,加剧行为体间互动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权威以作为应对不确定性的事前机制,提高参与者对不确定环境

的适应能力并促进新共同知识的形成。

权威,一直是演化经济学和不完全合同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在不完全合同中,存在两种类型的权威来源: 物质资产的所有权和知识或认知的能力。掌握物质资产的权威主体称之为“资源型权威”,这类权威控制和利用自身掌握的物质资产来作用于其他行为体,以应对共同知识变动中的不确定。而掌握关键知识或是认知能力的权威主体称之为“知识型权威”,“知识型权威”是对新环境拥有较强认知能力的参与者,这类权威由于掌握了关键知识而实际拥有决策权利,协调参与者之间对新场景的认知差异并增强参与者对新环境的认知能力^①。

当今国际社会的“逆全球化”态势体现出作为“资源型权威”的发达国家对“全球化”预期收益的不满。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一直发挥“资源型权威”的作用,通过对物质资源的投入支持原有国际治理体系,以实现全球治理的目标,促进自身和全球的发展。然而,当所有国家都将目光聚焦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所带来的收益时,却忽视了其为全球治理所付出的治理成本。伴随全球问题的日益复杂,发达国家为全球治理所投入的成本同样不断增加,而持续增加的治理成本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则导致其国内对“全球化”的不满和抵制。就演化经济学和不完全合同理论的框架而言,原有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治理体系是旧的不完全合同,而这样的不完全合同已经无法应对新的国际环境,从而引发对“全球化”的反弹。因此,为实现国家间的合作和共同发展,国际社会需要对当下的治理体系进行改革,降低全球治理的成本,从而达成基于新知识的不完全合同,推动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以提高各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预期收益。

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气候治理体系本质上就是各国基于共同知识而形成的不完全合同,而“逆全球化”态势作为新知识,冲击了原有的认知均衡,从而导

^①有关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参见: 黄凯南. 不完全合同理论的新视角: 基于演化经济学的分析[J]. 经济研究, 2012(2): 133-145; 黄凯南. 演化博弈与演化经济学[J]. 经济研究, 2009(2): 132-145; 于斌斌. 演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发展[J]. 经济评论, 2013(5): 139-146.

致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变迁,《巴黎协定》的达成正是这一变迁的体现。在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过程中,共同知识处于不稳定中,因此需要“权威”在气候治理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在过去的治理体系中,发达国家以其发达的经济和长期工业化的积淀掌握更多的物质资产,从而扮演了“资源型权威”的角色。他们通过对物质资源(包括资金、技术等)的投入,实现对现行“治理体系”的支持与维护并从中受益。但是,长期的资源投入导致发达国家全球治理投入成本的增加,降低了发达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预期收益,从而引发其对“全球化”的反弹和“逆全球化”思潮的涌动。如今的“逆全球化”态势某种程度上而言,是发达国家不愿意继续投入更多的治理成本,而从“资源型权威”位置上后退。从实践来看,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治理环境,传统的“资源型权威”已经无法承担高昂的治理成本,因而亟需通过治理体系的改革和调整,将新兴的“知识型权威”纳入治理的主体之中,并形成以“知识型权威”为重、“资源型权威”辅助的全球治理新模式。相比于“资源型权威”,“知识型权威”可能并没有掌握较多的物质资产,但却拥有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关键知识。通过自身的垂范和引领,“知识型权威”可以传播新的知识与观念,降低各行为体互动的不确定性,从而促成新共同知识的产生和新合同的形成。

目前,“逆全球化”的态势表明,作为“资源型权威”的发达国家已经无力或是不愿意继续承担高昂的治理成本,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则通过自身高速发展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全球化”和国际合作所带来的收益。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具有应对新环境的关键知识,而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等国家也有必要发挥“知识型权威”的作用,通过传播新的知识、发挥引领作用,改革现有的治理体系、承担治理责任,从而实现在“逆全球化”态势下全球治理机制向更为合理有效的方向变迁(见图1)。

四、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作用思考

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逆全球化”的态势将使中国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转而成为最大受害者^[11]。因而,面对“逆全球化”的态势,中国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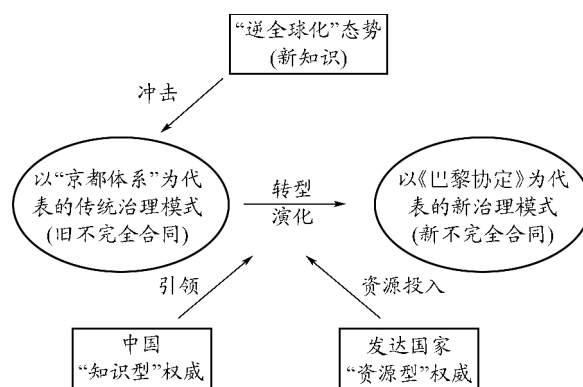


图1 全球气候治理演化经济学理论模型

能任由其发展而侵蚀人类社会合作共赢的已有成果,而是要做国际体系的贡献者和引领者,“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14],从而实现新形式、新模式下的“新全球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引领气候治理模式的变迁正是中国在气候治理领域积极参与、引领新一轮全球合作的体现。

从演化经济学和不完全合同理论的角度看,“逆全球化”态势反映出发达国家从“资源型权威”治理主体位置上的后退。伴随全球治理的日益复杂,发达国家为全球治理所投入的成本增加,而持续增加的治理成本则导致其国内对“全球化”的不满和抵制。归根结底,当前的“逆全球化”态势并不是说明“全球化”本身出现了错误,而是发达国家过去所主导的推进全球化体系已经无法应对新的国际环境。就全球气候治理领域而言,在原有的京都治理体系中,位列附件一的发达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承担了主要成本。一方面,这些国家需要履行减排的承诺。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附件一所列缔约方(主要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应个别地或共同地在2008—2012年承诺期内,将6种温室气体的全部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5%,其中欧盟接受8%减少量的承诺,美国接受7%减少量的承诺,日本和加拿大接受6%减少量的承诺,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则没有约束。减少碳排放,意味着发达国家国内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能源领域将受到巨大的冲击,

甚至面临经济下行的风险。另一方面,在京都体系中,发达国家需要为不发达国家提供大量的资金以帮助不发达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例如,2000年通过的《波恩协议》中包括建立气候变化专项基金和最不发达国家基金,《坎昆协议》中正式成立绿色基金并且启动发达国家300亿美元快速资金的运作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短期需要^①。减排承诺和资金转让所构成的巨额治理成本,使发达国家难以或者说不愿承担全球气候治理的责任,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责任分担”模式,则使各国在减排和资金转移问题上讨价还价、相互博弈。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京都治理体系最终走入困境、难以为继,使原本可以实现全球受益的气候治理陷入停滞。

面对“逆全球化”的态势和原有治理主体的后退,中国不能听之任之,而是要发挥积极的作用,推动全球低碳发展潮流深入发展,最终引领全球绿色发展方向,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10]。在“后巴黎”时代,中国不能仅仅将气候变化问题视为国家集团之间的博弈或是对有限碳空间的争夺,更不能将碳排放量作为“负外部性”权力的来源而以此在气候治理问题上讨价还价^②。在气候治理过程和治理模式演化中,中国应当通过传播新的知识和观念,扮演“知识型权威”的角色,从而引领气候治理模式向更为平衡的方向演化,为控制气候变化做出自身的贡献。

在巴黎气候大会前后,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以自身行动发挥“引领”作用,为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和全球气候治理模式的转型做出贡献。在巴黎气候大会召开前夕,中国即与美国、法国、印度、巴西等主要经济体分别发表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多个联合声明,为巴黎气候大会凝聚共识。在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在气候问题上积极传播新的治理理念,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模式的转型。在大会上,中国领导人提出“各尽所能、合作共赢”“奉行法制、公平正义”“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理念,倡导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实现未来全球治理的模式。在最终通过的《巴黎协定》中,“自主贡献”的治理模式正是“各尽所能、合作

共赢”思想的生动体现。此外,中国主动提出有力度、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率先垂范为全球减排做出承诺。在巴黎气候大会召开前夕,中国主动提出自主贡献目标,承诺在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中国国家自主贡献的提出,一方面表现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决心,另一方面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做出表率。中国同时还以具体行动践行低碳减排的理念,为全球减排做实事。在国内层面,中国将气候变化行动纳入生态文明建设和“十三五”规划之中,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和能源结构的转型,积极回应全球长期减排和低碳发展的需求,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治理的协同治理并提高自身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的建设^[6]。在国际层面,中国领导人在公开场合肯定《巴黎协定》的积极意义,表示《巴黎协定》符合全球发展大方向,成果来之不易,应该共同坚守,不能轻言放弃^[15]。总而言之,中国以自身的实践和承诺为全球气候治理做出贡献,为其他国家提供良好的示范,更为重要的是,在参与气候治理的过程中,中国以自身的经验,将“自愿贡献、各尽所能”的原则纳入全球气候治理之中,改变了原先“责任分摊”的旧思想,引领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模式,从而避免了在京都体系中各国推诿责任的局面,提高了各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性,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根据演化经济学和不完全合同理论的模型,在共有知识发生危机、不完全合同处于变动的过程中,权威需要发挥其作用和功能以提高参与者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然而,京都治理体系的失败表明,发达国家试图通过承担减排责任,实行资金转移而扮演“资源型权威”的道路已经走不通,过高的治理成本使发达国家无力继续投入治理资

^①关于此问题可参见:王学东:《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博弈与各国政策研究》[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4。

^②关于负外部性权力的理论可参见:谢来辉:《碳排放:一种新的权力来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9):64-89。

源以维持旧有的治理体系,在治理体系的演变过程中,需要新的权威以继续促进新治理模式的达成。中国则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传播自身成功的经验,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从而扮演“知识型权威”的角色。

中国扮演“知识型权威”的角色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首先,中国是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参与者,同时也是其贡献者和建设者,因而面对“逆全球化”态势,各国纷纷从治理主体位置上退却之时,中国有责任、有义务承担起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责任与使命,这不仅仅符合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诉求,同时也是中国大国形象的体现和对全球发展的贡献。其次,在发达国家“逆全球化”思潮盛行之时,只有中国可以扮演引领全球合作和治理体系演变的权威性作用。作为“知识型权威”,最重要的是掌握处理未来不确定事件的关键知识,而中国通过自身成功的实践证明,中国所提出的新理念可以行得通、走得稳。在气候问题上,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担心自身经济的发展而拒绝做出减排承诺,在哥本哈根大会等一系列气候会议上,中国甚至遭到世界各国的责难。然而,中国在巴黎气候大会中的积极推动作用和主动提出承诺、参与减排的事实表明:中国以自身的经历证明,在全球变暖的威胁之下,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符合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不仅愿意减排,而且主动提出减排的承诺。中国通过自身的言行,向世界展示,只有在全球合作减排的模式之下,全球气候治理才可能成功,各国才可以从全球气候治理中获得最大的收益。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国以自身的发展经验掌握了“关键知识”,而通过对“关键知识”的传播,中国则可以将自身的经验推广,从而促进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向更加均衡与合理的方向嬗变。

中国所扮演的“知识型权威”与发达国家的旧有治理模式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在京都治理体系中,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的治理基于自身的物质资源,通过承诺减排和资金转移以实现减缓的目的。但是,气候谈判的停滞和“逆全球化”的国际态势表明:这样的治理体系不仅无法达到控制温

室气体排放的目的,反而导致发达国家因为过高的治理成本而走向背离全球治理的道路。而中国所扮演的“知识型权威”并不依赖于中国所掌握的物质资源,而是更为强调中国在气候治理问题上所掌握的关键知识,通过知识的传播帮助各国形成新的共同知识。正如在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的所作所为——中国通过提出新的价值和理念,适应变动中的气候治理体系,从而引领各国走向“自主贡献”原则下的全球气候治理新模式。

但需要指出的是,“资源型权威”与“知识型权威”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并非相互对立,而是互为补充。京都治理体系的困境表明以“资源型权威”为治理主体的体系难以支撑,因而需要以中国为代表的“知识型权威”发挥更为有力的治理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将“资源型权威”或者说将发达国家排斥在气候治理外。实际上,只要存在全球治理,则必然会存在治理成本,而作为掌握更多物质资源的“资源型权威”,发达国家必然需要在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更大的治理责任,这也是《巴黎协定》同样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的原因所在。中国对气候治理的参与不是对已有治理体系的颠覆而仅仅是对其进行修正,通过发挥“知识型权威”的作用,中国将引领气候治理体系向更为平衡的方向发展。在新的治理体系中,“知识型权威”与“资源型权威”相互配合,资源和知识紧密相连,各自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各国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承担减排责任、进行资金转移,从而共同促进全球气候治理的深入,而《巴黎协定》的通过正是这一新治理体系的一个初步体现。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所引领的气候治理体系变迁不仅仅为作为“知识型权威”的新兴经济体谋利益,同样也适应了作为“资源型权威”的发达国家的需求,更是符合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大势。

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仅仅是整个全球治理体系或者说全球合作模式中的一个侧面,在“逆全球化”的态势之下,中国需要在整个全球治理体系的变动中,扮演好“知识型权威”的作用。就演化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旧有的治理模式建立在旧有的共同知识之上,在这样的模式中,国家间博弈、

对抗的话语占据了全球合作的主导。而“逆全球化”的思潮作为一种新的共同知识,冲击了原有的不完全合同,使旧有的治理与合作模式面临崩溃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传播以协作共赢、自愿参与、各尽所能为核心的新知识,发挥“知识型权威”的引领作用,从而促进国家间共同知识的转变,在新理念之上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成功转型是一个成功的案例,而在其他领域,中国同样需要提倡新的合作理念,从而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五、结语

在如今“逆全球化”的态势之下,国家间原有的共同知识发生危机,而共同知识的变化则可能引发国际机制的变迁。当今国际社会的“逆全球化”思潮反映出发达国家对旧治理体系收益的不满和从“资源型权威”位置上的后退,暴露出旧有治理体系的不足。但是对“全球化”的不满并不应该归咎于“全球化”本身,而是应该通过改革治理模式,降低全球治理成本,从而实现国际治理体系向更为平衡与合理的方向演变。在体系的演变过程中,原先的认知均衡被打破,因而可能出现短期的不稳定性,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则需要在机制演变的过程中积极参与,扮演“知识型权威”的角色,发挥引领作用,传播新的治理理念,从而促进新知识的形成和治理机制的转变。在巴黎气候大会中,中国积极践行“自主贡献”的治理模式,通过传播新的治理理念、提出有力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切实采取减排行动,推动了《巴黎协定》的通过,从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模式的变迁,实现了气候治理由“责任分摊”到“自愿参与”的模式转变。

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发挥引领性作用的实践,为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提供了借鉴。在2017年初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习近平指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紧迫性越来越突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引领世界走

出困境,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15]。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两个引导”的理念,即“引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14]。面对如今国际社会“逆全球化”的态势,在其他国际议题领域,中国同样需要发挥引领的作用,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在“逆全球化”的态势下扮演好“知识型权威”的角色,为最终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自己的努力。

参考文献:

- [1] 新华社. 习近平: 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EB/OL]. [2017-05-13].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3/c_1116812159.htm.
- [2] 新华社. 习近平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EB/OL]. [2017-05-13].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2/01/c_1117309642.htm.
- [3] 新华社. 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的开幕辞 [EB/OL]. [2017-05-13].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9/04/c_1129268987.htm.
- [4] 郭强. 逆全球化: 资本主义最新动向研究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3(4): 16-21.
- [5] 景丹阳. 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危机和“驯服”全球化 [J]. 国际展望, 2017(1): 52-69.
- [6] 高云.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后中国的气候变化应对形势 [J].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17(1): 89-94.
- [7] 庄贵阳, 周伟铎. 全球气候治理模式转变及中国的贡献 [J]. 当代世界, 2016(1): 44-47.
- [8] 张晓华, 祁悦. “后巴黎”全球气候治理形势展望与中国的角色 [J]. 中国能源, 2016(7): 6-10.
- [9] 何建坤. 全球低碳化转型与中国的应对战略 [J].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16(5): 357-365.
- [10] 李慧明. 全球气候治理新变化与中国的气候外交 [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 29-39.

- [11]胡鞍钢,王蔚.从“逆全球化”到“新全球化”:中国角色与作用[J].学术界,2017(3):5-17.
- [12]张利娟.全球治理的中国担当[J].中国报道,2017(2):16-17
- [13]陈伟光.逆全球化暗流与中国应对[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12-23(005).
- [14]新华社.习近平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强调: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02-18(01).
- [15]新华社.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EB/OL].[2017-05-13].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1/18/c_1120331545.htm.

An Analysis of China's Leadership in Climate Governance in Context of De-globalization: From a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Perspective

WANG Xuedong, SUN Ziq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un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e Paris Agreement* has created a new governance model for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INDC and marks a new stage in fighting against the climate change. But the worldwide de-globalization has cast a shadow over the future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bringing out new uncertainties. Based upon the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Incomplete Contract Theory, the current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system could be seen as incomplete contracts formed by all the countries with limited cognitive rationality. De-globalization trend reflects the participants'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expos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original model, which finally undermines the original cognitive balance in the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a different climate governance system on the basis of new common knowledge should be established, which requires all the countries to reform their original models, to adjust the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In this process, China needs to take an active role as the knowledge authority by disseminating its own experiences and creative ideas, leading the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system towards a right direction: justice and balance. China has proposed the ideas such as win-win cooperation, rule of law and fairness, inclusiveness, mutual learning and common development during the Paris Conference. In that sense, China has actually contributed "Chinese wisdom"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in climate issue and other areas as well.

Key words: evolutionary economics; climate governance; de-globalization; China leadership

【责任编辑: 章 诚】